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世界各大文明都是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如果我们比较世界各大文明的特点,很难说哪一种文明绝对的好或差。一种文明能否生存和繁荣发展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应对每一时代新出现问题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多方面的,有来自自然环境的,有来自外族入侵的,有来自生产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有来自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秩序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秩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按照黑格尔、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看法,中国位于世界地缘东方一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与世界其他文明接触的机会较少,经常处于封闭状态。中国挨着印度,在历史上与印度文明有所交往,如佛教的传布;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有一定的商贸关系,如丝绸之路。但由于有着喜马拉雅山和沙漠的阻隔,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很有限。中国虽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乃至被占领和统治,但这些游牧民族文明水准低,其结果是同化于汉族的儒家文明。由此,中国人容易养成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大的心理。中国不像西方,在那里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有一个长期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而且在中世纪后期受到阿拉伯文明的强大冲击,激起一股文化复兴和政治改革的浪潮。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展开了夺取制海权、掌控海上贸易和占据殖民地的战争。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侵扰中国,葡萄牙占据了澳门,荷兰占据台湾,特别是英国,在把印度占据为殖民地后,用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在那时一下子遭到列强的暴力打击,难以自适。这时大清帝国统治者的文化心态是从幻想自欺到茫然无措。有关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再锐利不过:“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

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对外开放才有活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期,是对外文化交流做得好的时期,如盛唐时期;而中国文化停滞发展时期,则处于明清的闭关锁国时期。中国近四十年来的巨大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

一个国家要走入先进的现代社会,必须进行制度层面上的有效改革。黑格尔谈到,西方走入现代社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而宗教改革是从反对天主教會的腐败开始的。

在世界历史上,一再出现帝国之间的战争、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农民起义和皇朝的更替。总览这些历史现象,只有当引发了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时,社会才真正取得进步。中国不乏农民起义和皇朝更替,但中国社会在两千年中停滞不前,这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有关这一点,马克思也看得很清楚。他在1862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把中国社会形容为“活的化石”,认为像太平天国这样一类中国历史上三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犹如活的化石“开始革命”,只是破坏性的动荡,不会引发社会进步:“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中国是被外族王朝统治着。为什么过了三百年不能来一个推翻这个王朝的运动呢?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所共有的。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

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毫无疑问,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是靠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在中国历史上,破坏性的动荡太多了,这是“活化石”社会中表面起死回生的轮回,实质毫无建设性的进步。中国走入现代社会在磨难中开始,在曲折中前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次跌宕起伏,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迎来希望。中国近四十年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取得如此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从世界人类文明史看,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至理名言。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还停留在自然直观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概念思维的层次,现代科学需要高度抽象的概念、普遍的原理、严格的逻辑推理。因此,在中国式的自然直观的基础上是发展不出现代科学的。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如王树人,主张“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象思维”是动态整体直观的悟性思维,最富于原创性,有助于艺术创作,有助于悟道,是把握人生真谛的最佳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象思维”是停留在直观形象化的直接性上的思维,还没有达到精确的概念和逻辑推理的层次。我们不但需要“象思维”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把经验事实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些,建立一种可以推导和可以验证的理论体系,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科学。

黑格尔还认为,中国的皇帝—臣民的天朝国家是停留在自然层次上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政治制度,在那里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主体精神,即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主的思想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自主地追求普遍真理,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法制治理下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国家。这一观点值得我们反思为何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比起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还受到严重限制,主张真正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在此也需要记住马克思的这一“初心”。

当然,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传统哲学中的观念并非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低级和粗浅。中国五四时期的部分文人过分缺乏文化自信,唯西方是好。甚至有人主张要去除中国的象形文字,要把汉语改为拼音字母的语言,使得中国人用语音说的白话与书面文字相一致。他们还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太偏激了。中国确实从明末清初开始滞后了,但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包含许多值得开发的积极因素,它们犹如种子发芽一样,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需要我们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解释,使之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西方走入现代化之途,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中华文明中儒家“天下一家”的政治观,墨子“兼爱”的道德观,对于当今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来,中国政治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念的继承,是面向世界的宽广胸怀。当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全球生态问题、全球资源问题、全球贸易问题、全球和平问题,都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唯有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一家”的思想。西方思想家考虑政治问题,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中国儒家士大夫的座右铭是“天下之事匹夫有责”。相比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有全人类的关怀。当然,我们首先要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此才能“兼济天下”。

儒家倡导“仁”,以“仁者爱人”为伦理的核心,从中可以开发出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儒家要求每个人都应遵循伦理道德,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互相和谐和秩序井然。现代社会强调法治,但法律离开了道德,难以赢得民心,难以真正保护民众的权利。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从中可以开发出民主思想。儒家中具有“大同”思想。这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从“据乱世”到“小康”再到“大同”社会,这是中国儒家思想家树立的努力目标,无论现实的处境如何恶劣,中国人总能从动乱的灾难中一次又一次爬出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经久不息的内因。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活力。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使旧邦维新,保持活力,推动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约20000字